



■ 本报记者 栾 鹤

周德文很忙,头衔很多: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等等。但他真正为公众所知,还源于他对温州经济一次次的准确预言: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初露端倪,他深入温州广大中小企业调研,得出“温州20%左右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的结论,预言“倒闭潮”。他向温州市政府提交报告,在媒体发声,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久,“预言”变为现实,温州及全国的中小企业出现较大面积的停工、倒闭。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也亲临温州调研,随后,旨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一个个浮出了水面。

2011年1月,周德文再次向社会发出预警:“今年中小企业可能陷入新一轮发展和生存危机;要警惕民间借贷风险集中大爆发;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危机四伏,如果银根进一步紧缩,下半年,40%的中小企业将处于半停工、停产甚至倒闭。”3月,温州接连发生了企

周德文:民间资本上演“困兽记”

业主跑路、跳楼事件。9月,温州民间借贷危机集中爆发,“跑路潮”造成企业和社会恐慌,国务院暗访组抵达温州。

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率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银监会主席等大批财经高官到浙江调研。10月4日,在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的陪同下,温家宝来温州考察,与当地中小企业家座谈,周德文被点名参加。周德文向温总理面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生存的真实情况,提出五条建议,并不时回答总理的问题,汇报近半小时。温总理当场点评说:“你系统地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的政策建议,你是温州最权威的发言人”。

守护民间资本

1983年,周德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温州大学任教,开始跟踪研究“温州模式”和“民营经济”。1993年,他从温州大学辞职,办起了企业,他将企业作为自己的试验场,浸泡商海,深谙民间资本发展的“困”与“惑”。

1999年,周德文向市政府建议成立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他说:“当时,《中小企业促进法》还没有出台(2001年),我们是公认的中国第一家。”

温州的企业愿意找周德文,是因为他能提供一个与政府沟通的畅通渠道,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内地招商团找他,是因为他掌握着大量的温州企业资源,能够提供双方接洽的机会。

中小企业无力聘请专职律师,促进会就组织了律师团,免费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帮中小企业维权。之后,周德文联手温州市总商会,筹建了温州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后又独立筹建了温州银信企业贷款担保公司,推动了温州担保体系的形成。迄今,温州市已拥有200家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数十亿元的贷款担保。

在温州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周德文以温州市政协常委的身份建议成立温州市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虽然市府办书面答复严肃对待,但对建立投诉中心一事未明确表态,只是说“将在下一步机构改革中予以统筹考虑”。周德文坚持不懈,举促进会班底的合力,持续建言,终于将“温州市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的牌子挂到了市政府。随后,温州市下属的几个区县都建立了这样的投诉中心。这在浙江乃至全国,首开了中小企业维权的先河。

他提出的《关于创新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议案,被民进中央作为全国政协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获民进中央2009年度参政议政优秀成果一等奖;《关于促进浙江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建议》被评为浙江省人大2010年优秀议案和建议。2011年,周德文组织力量自费进行课题研究,为国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资本投资促进法》(草案),并上报民进中央,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被全国人大列为重点议案,列入立法程序。

为温州资本正名

妖魔化温州人似乎成了一项全民娱乐。

“炒房”、“炒煤”、“炒棉”、“炒黄金”、“炒商铺”、“炒油田”,在大众传媒的视角中,温州资本的一切活动,都以一个动词开头,就是“炒”。一有物价上涨,温州资本理所应当成为第一个“假想敌”。

温州人最饱受诟病的就是“炒房”。周德文说,事实上,在温州人购房行为背后,隐藏着买房人、房地产开发商、政府三方利益格局,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则是当地政府。有些地方无法应对中央对该地区房价高涨的问责,温州购房团成了理所当然的替罪羊。

2010年,温州人炒大蒜的消息甚嚣尘上。周德文赴山东省金乡县实地考察,发现在当地做大蒜生意的温州人不到10家,当然也不存在所谓“温州资本爆炒大蒜”的事情。

温州人在迪拜、山西、海南折戟的消息接踵而来,网络上叫好声一片。事实上,对于温州资本,人们并不了解,更缺乏深层次的认知。

周德文出版了温州经济系列专著:《温州百年经典》、《温州商界新锐》、《解读温州商人》、《温州样本》等,向外界解码温州资本,为温州资本正名。

南宋以来,温州便是商贾云集的地方,经商似乎是温州人的天然选择,如今,温州果敢的经济行为需要赢得理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炒”字。

在中国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资本始终表现出了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如此,注定了其一定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领先一步走非公有制的温州,为找寻身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温州究竟姓“资”姓“社”,还是一直困扰着温州民营企业界人士的心头之痛。

周德文说:“温州资本参与国企改革,进入资源行

业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为正常的投资行为,不应该被戴上‘炒客’的帽子。”

中国的蜕变就是从垄断到竞争的裂变,即民间资本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力度与广度不断增加的裂变。“为富者,必不仁”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这种社会情绪仍在蔓延。

为民间资本困兽寻求出路

温州地区方圆不过100公里,却能搅动全国的投资市场。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温州有强大的民间商业信用体系及投资组织机构,往往能迅速调集落在民间的大量资金,集中投向高利润行业。

周德文坦言,中国面临的一大危机就是信用体系崩溃。银行与企业间信用危机,银行把企业看成小偷,不敢给企业贷款,扮演“晴天送伞,下雨收伞”的角色;企业则抱团不还银行的钱。一旦一家银行收了一家企业的贷款,就有可能造成多家银行同时压贷、收贷,从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使得风险快速传递。

企业间的信用也是危机重重,三角债蔓延,过桥资金链断裂。周德文发出新的预言:中国新一轮三角债危机即将来临,甚至比朱镕基时代还严重。

周德文说,温州民间沉淀资金7600个亿,如集中进入某一领域,无论进到哪个领域都如猛兽一般,会撞垮围堤。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资本希望把钱投到“阳光地带”。

眼下,周德文正在牵头打造一个投资非洲的控股集团,聚集民间资本,协同出海。投资非洲大陆,既符合国家战略部署,也给巨额民间资本一个疏导渠道。合作的“先遣部队”早已深耕非洲多年,在非洲大陆有着广泛而扎实的投资网络。12月初,受西非科特迪瓦和加纳两国的总统办公室邀请,周德文将率中国企业代表团前往签订矿产、房地产、化工等多领域的项目合同。

周德文说,民间资本自身也应该进行反思,在投资过程中,是否过分推崇“丛林法则”,显示了浮躁与贪婪?“商行天下”,对于民间资本早已不是问题,下一步,要做到的是“善行天下”,更多地显示中国民间资本的正向力量。

总裁论道

清晰的方向来自灰度

■ 任正非

我们强调开放,更多一些向别人学习,我们才会有更新的目标,才会有真正的自我审视,才会有时代的紧迫感。

一个领导人重要的素质是方向、节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一个清晰方向,是在混沌中产生的,是从灰色中脱颖而出,方向是随时间与空间而变的,它常常又会变得不清晰。并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期里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

妥协一词似乎人人都懂,用不着深究,其实不然。妥协的内涵和底蕴比它的字面含义丰富得多,而懂得它与实践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华为的干部,大多比较年轻,血气方刚,干劲冲天,不大懂得必要的妥协,也会产生较大的阻力。

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虽然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不灭的影响,但大多没有达到变革者的理想。我认为,面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变革太激进、太僵化,冲破阻力的方法也太苛刻。如果他们较长时间来实践,而不是太急迫、太全面,收效也许会好一些。其实就是缺少灰度。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划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一些或粗一些来看,它的方向仍是紧紧地指着前方。

我们今天提出了以正现金流、正利润流、正的人力资源效率增长,以及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将权力通过授权、行权、监管的方式,投给直接作战部队,也是一种变革。在这次变革中,也许与20年来的决策方向是有矛盾的,也将涉及许多人的机会与前途,我想我们相互之间都要有理解与宽容。

坚持正确的方向,与妥协并不矛盾,相反,妥协是对坚定不移方向的坚持。

当然,方向是不可以妥协的,原则也是不可妥协的。但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切都可以妥协,只要它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什么不能妥协一下?当目标方向清楚了,如果此路不通,我们妥协一下,绕个弯,总比原地踏步要好,干嘛要一头撞到南墙上?

“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凡是人性丛林里的智者,都懂得恰当时机接受别人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妥协”是双方或多方在某种条件下达成的共识,在解决问题上,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它却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有不少的好处。

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一味地让步。明智的妥协是一种适当的交换。为了实现主要的目标,可以在次要的目标上做适当的让步。这种妥协并不是完全放弃原则,而是以退为进,通过适当的交换来确保目标的实现。相反,不明智的妥协,就是缺乏适当的权衡,或是坚持了次要目标而放弃了主要目标,或是妥协的代价过高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双赢”和“多赢”,否则必然两败俱伤。因为妥协能够消除冲突,拒绝妥协,必然是对抗的前奏;我们的各级干部真正领悟了妥协的艺术,学会了宽容,保持开放的心态,就会真正达到灰度的境界,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

(作者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焦点人物

勇立潮头又一春

——访世界华人协会会长程万琦博士

■ 本报记者 程立铭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程万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见证并且参与了这一辉煌壮丽的过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世界华人协会会长和全球市长论坛理事会理事长,程万琦对此有什么新的见解和期望?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记者采访了程万琦。

程万琦虽然已过70高龄,却精神矍铄,思维敏捷。

他高兴地回忆起了与中国改革开放有关的一些事情。

他告诉记者,在改革开放前,回中国内地时看到当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都不富裕,心里感触颇多。

一次在与华国锋见面时,他提出中国要搞改革开放,工厂和农村都不能继续大锅饭的政策,付出多的人应该多收入,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强大。当时,他还对华国锋表示自己可以说服海外华人到中国大陆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当时的经济贸易。

但是由于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华国锋身不由己,以中国要“自力更生”为由拒绝了程万琦的倡议。

10年后,程万琦再次与华国锋见面,程先生说:“华老,你的功劳很大,没有你,就解决不了‘四人帮’的问题,改革开放就没办法进行。”华国锋很高兴。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程万琦再次向邓小平当面提出中国要搞改革开放,他说:“邓伯伯,死工资,没奖励,人民公社三个和尚没水吃,一定要让老百姓多劳多得!”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后,程万琦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1992年8月,经过20余年的筹备,世界华



程万琦(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人协会在香港成立。当时,来自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领出席了成立大会,逾千名海内外商贾名流参加,场面十分壮观。

记者了解到,世界华人协会下设12个专业委员会,至今已有600万会员,其中,50%以上是商人,90%是团体会员,分布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日前胜利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程万琦表示,世界华人协会的会员大多数是生意人,在全世界什么关系都有,可以进一步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给予大力帮助。

程万琦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突破,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很有思想,很有魄力。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仍然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成就巨大,为此,他非常高兴。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他表示,“寄予厚望,很有信心”。

谈及自己的家庭,程万琦满脸的自豪。他告诉记者,他的曾祖父是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黑旗军”手下的将领,“黑旗军”人少武器差,以

基本是冷兵器的装备抗击法国侵略,却取得战争胜利,进入越南。其祖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曾经担任南方政府的秘书长,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为官清廉,晚年以教书为生。其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他本人在越南出生和成长,早年接受的是法文教育,1954年移居香港后,接受了英文教育。

除世界华人协会之外,程万琦现在还担任世界篮球协会永远名誉会长等众多职务,长年为世界经济文化发展奔走于世界各地。

他说,从小就接受了祖辈的爱国教育,海外华人,漂泊万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要关心祖国的发展,帮助祖国发展。“我不会发中国人的财,不要做官。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比什么都好!”

采访结束时,程万琦应记者之邀给《中国贸易报》挥笔写下“把全球关系搞好”七个大字,殷殷之情,溢于纸上。

商海人生